江 海 星 火

东北军 111 师抗日义勇宣传队始末概述

孙卜菁　刘祖荫

东北军111师抗日义勇宣传队队史,原来指望徐惊百、邹强执笔，因为他们是原东北军 111 师抗日义勇宣传队的创建人与党组织的领导人，不幸他们都过早逝世。后来发现邹强写的《南通城区青年学生争取抗日权利的斗争》(载于《江海奔腾》第三辑),是一份重要的资料,但比较简略。我们在世的老队员，特别是王衍、周丕炎、孙学仁等，把执笔概述宣传队始末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两人，我们感到义不容辞，但掌握的具体资料不多，只有依靠有关人员共同回忆。经过 14 年来的积累、修改、补充，并利用工作间隙，力求实事求是地整理出来。取题《江海星火》,意图表达抗日义勇宣传队的几个革命知识分子联合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一点作用。本文中所用的历史背景材料,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甲子山下正气歌》(辽宁人民出版社《星火》杂志第三辑)、《回忆常恩多将军》(吉林人民出版社)及邹强的遗作为依据。具体资料由赵开云、王衍、江涛、徐微、孙术、邹泰等提供。1987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中共南通市委在南通召开的“原东北军 57 军 111 师抗日义勇宣传队史料讨论会”,对这份史料的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修改补充。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使本文成为一份较完整和较准确的历史资料。

建 队

东北军 57 军 111 师抗日义勇宣传队建立于 1937 年 9 月上旬，是在中共 111 师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

当时，中共中央已于 7 月 8 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的爱国进步青年奋起响应，纷纷联合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被迫于 14 日发表“自卫宣言”。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时，大江南北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声势越来越大。7 月中旬，东北军第 57 军 111 师从河南周口镇出发南下。8 月底，进至长江口，在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沿线守卫江防，代号“扬开多”。师长常恩多率师部驻在南通城，并成立戒严司令部。9 月下旬，中共第 57 军（后改为 111 师）工委会负责人王维平（即王振乾）去南京向周恩来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从此，师工委坚持我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政策，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反对国特汉奸，支持民主运动，呼吁东北军广大官兵奋勇抗战，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111 师在中共特别党员，被

誉为“常胜将军”常恩多师长指挥下，坚持抗日，转战在苏鲁皖边境地区，并且在 1942 年 8 月 3 日，在反投降、反内战的激烈斗争中起义，参加了八路军。常恩多师长积劳成疾，不幸于起义后的 8 月 9 日病逝在鲁南，终年 47 岁。抗日义勇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

111 师抗日义勇宣传队的最初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徐惊百、邹强、钱彤（钱素凡）、吴质（吴功铭）、王衍（王颂旋）、江涛（沈俊仁）、孙振中、孙卜菁。当时，他们都是在沪、宁等地读书的大学生。他们的小学、中学生活，就处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南通地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及进步老师的爱国主义启蒙，使他们热爱祖国，立志不当亡国奴，其中有几个人，在三十年代初曾参加过共产党、共青团，后来由于复杂的斗争形势或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失去了组织关系，但在政治思想上一直紧跟着党中央的路线。特别是在“9·18”事变以后，从现实生活中，他们越来越深刻具体地识别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祸国殃民；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5 年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炮火声中，我们读到了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八一宣言》，理解到跟着共产党走，唤起人民，团结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每年我们都利用假期，在南通地方报纸上办副刊，利用教堂办“学生暑期补习班”。举行知识青年交谊联欢活动，召开专题座谈会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1935 年 11 月，我们曾联名在南通报上发表了《为华北事变宣言并告南通知识界》。呼吁知识界团结起来，注视时局的演变，积极开展抗敌防奸的活动。徐

惊百等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和中央大学的同学赶赴绥远抗日前线劳军。我们积极声援‘12·9”救亡运动。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纷纷返回故乡，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政府的“自卫宣言”,自发组织‘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筹备场所最初设在东门龙王桥徐惊百家里，名称定了，袖章做了，但同国民党县党部接洽时遭到阻挠。我们也曾经想在南通唯一的临时报纸《南通各报联合刊》上，编一个副刊，而办报的人荒唐地要每期出二十元的印刷费，企图限制我们，究学生当然出不起，也决无不取稿酬倒贴印刷费之理！后来，我们找到国民党县长洪声，他只是敷衍几句，让我们碰个软钉子。接着，又由孙振中等商得省民众教育馆的爱国进步人士孙东儒、丛介生等的同意，借用其大厅，开展了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活报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书写标语等活动。这些革命行动，当时都遭到国民党县党部内顽固势力的阻挠与破坏，我们据理力争,指责他们把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训示”置于何地？揭露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防共的虚伪面目，也藉此教育了青年朋友们。1937 年 8月 17 日，敌机开始空袭南通城，炸毁医院，国民党的这些家伙便逃得无影无踪了。当时全城人心惶惶,十室九空,就在这个时候,111 师布防长江口,师部进驻南通城。

在“12·9”运动中,我们就已经了解和同情张学良将军和他统率的东北军，对他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团结抗日作出的重大贡献，更为饮佩。我们认为 111 师是一支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一定要接近它，进一步了解它。于是派代表访问了师部，受到常恩多师长、张伟斌副师长、王维平秘书等人的诚挚欢迎,热情接待。他们所表达的团结抗日的决心,更

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为部队组织慰问演出，合唱了《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烙痕》等活报剧与话剧，得到了部队的共鸣与好评，往往官兵与演员声泪俱下，一派激情。《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影响最大，卖艺人(陈瘦秋饰)和香姐(张聪武饰)的形象，在广大部队官兵的记忆中长期不灭。我们和部队之间，相互了解与保证赖的民族感情，亦随之增长。

这时，我们这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队伍已经增加到近30人，正式参加宣传队的，除上述发起人外，还有赵琅、陈瘦秋、王坚、钱彬、张继岚(女、张非武)、吴禾生(女，兰琼)、孙术(女)、孙永馨(女)、徐微(女)、徐楠(女)、徐娴(女)、梁腾、余仪孔、薛鹤年、高维炳等。没有正式参加而经常协助工作的有张聪武(女)、邹泰。有着很高的抗日救国热情。他们都是具有中学或大学文化程度的爱国青年。他们中有的是姊妹俩、兄弟俩或亲戚，相互了解，相互依靠。

随着抗日活动的开展，我们日益感到需要一个合法组织的公开名义，需要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分析111师可能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徐惊百、邹强提出以“抗日义勇宣传队”的名义，争取111师的承认与支持，大家一致赞同。徐惊百的父亲徐德称是前清举人的儿子，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对东北军颇有好感。徐惊百动员他为我们介绍，在他的帮助下找到师部，又转介绍给师部政训处，提出了成立“抗日义勇宣传队”的要求。我们也考虑到政训处是重视上层关系的，便通过南通大企业家、教育家，前清状元张季直的孙女孙继岚姊妹俩作其他名门子弟的社会关系，再加县长洪声（东北人)为了和111师拉关系，也表示赞助，因此很快得到许诺。10月间，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抗日义勇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队”正式成立了，队部驻东南城脚十八号（现为环城路三十九号),我们在部队和地方的宣传活动就此合法化了。

抗日义勇宣传队（下简称宣传队）成立时，政训处处长宋迪玺派秘书叶崇统向我们宣布以下几点：(1)111 师编制员额，军事委员会有规定限制，不得擅自超编。因此，地方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宣传队可以 111 师番号定名称，不列入政训处政工人员的编制，但受 111 师领导。(2)部队经费有限，宣传队既属义勇志愿性质宣传队成员属无给职,不叙军衔,不给薪饷，每人发给军服一套，皮带一付。办公费、宣传活动费统一由师部供给。（3）宣传队人员名额不得超过 30 名。(4) 政训处派少校政训员段克文为宣传队队长。我们认为以上条件对保持宣传队的相对独立性是有利的。同时，我们对宋迪玺等人的阴阳怪气也有所警惕，后来事实证明，政训处既怀疑我们，又想加以控制利用。段克文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是派来监视我们的,他千尽了挑拨离间,造摇破坏的勾当,我们经常要为维护民主生活而进行斗争。终于在 1938 年秋,由于段克文亡图开除队员钱薇阁，关粗暴地摔出钱的行李，引起公愤。我们利用宋、段的矛盾，向宋迪歪控告，合法地把段撵走了。从此，在宣传队内部实现了民主管理，大家推举孙卜菁负责生活管理部的工作。宣传队成立后，名义上归师政训处指导,实际是在中共 111 师工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当时，师工委正在寻找抗日进步的青年团体，由于发现了我们，工委王维平、张苏平、曹健华（即华诚一）便很快地和宣传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们为了坚持团结抗日，保持合法地位,认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原则精神办事。为了体现我们保空卫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了表达我们义勇抗日的无私胸

怀，宣传队员一般都是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服，花自己的钱去开展活动,力求不花部队的经费,不要部队的待遇,一心要把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好。宣传队的这种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一意为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精神,得到了广大官兵的赞扬。宣传队的活动，也得到了广大官兵和地方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这些战友之情，更鼓舞了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国民党政训处依靠宣传队的力量，在南通出版的机关报——《军民导报》,从编辑到发行都由宣传队掌握，因此，内容都是宣传抗日的。这份报纸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初期是油印的，新闻来源是由张非琥、徐微等，收听无线电广播，速记下来，有的是由梁腾、余仪孔等设法通过县政府电台搞来的抄件。后来，师长常恩多专门指定一个电台抄收新闻电讯，翰墨林印书局的工人（当时负责人“逃难”去了,由工人“维持”,其中有后来担任我刘桥区长的吴琪即吴晴江）每天给印刷。国民党报棍子在经销条件上百般刁难，唆使报社会不同我们合作，我们便派人直接掌握报贩，既没有中间剥削，又比通过报社发行迅速，发行份数在三千份以上，发地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各市镇及 111 师各连队,发行量越来越大,超过了南通地方报纸。《军民导报》是由徐惊百、邹强、赵琅、钱彤、江涛分工负责，还聘请了史白(施春瘦)为特约撰稿人。《军民导报》出片了 37 期，第 38期已编排好，因部队转移，未及付印。我们组织了由孙卜菁、王坚分工负责的歌咏队，深入到连队教唱歌曲，这是接触部队基层群众的萌芽。我们还组织了由吴质、吴功铨、王衍、孙振中和陈瘦秋分工负责的演出队。我们自己编了个队歌，借用苏联歌曲《祖国颂》的曲子，集体作了词，演出效果很好。可惜现在已记不全了。我们不但在剧场演出，而且

在街头演出活报剧,一时轰动了南通城,后来还深入到连队去排戏。上海的孩子剧团和儿童歌咏队路过南通前往武汉,我们予以接待并组织了几次演出,影响很大。我们还利用镇压汉奸的机会,配合军法处在犯人游街时和刑场周围宣传抗日除奸,取得很好效果。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从师长、旅长、团长,师部八大处、直属队,发展到营、连战斗部队,从南通城逐渐发展到海门、启东的江防驻军,部队的抗战情绪在高涨,我们的工作热情也在高涨,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气象一新,直到现在,60 岁以上的南通父老对此还留有良好的记忆。

上海、太原失陷后,形势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1937 年 11 月中旬,111 师奉命撤离南通城,向靖江、扬州、高邮、宝应一带转移。宣传队内部也发生了变化。部分人员决心随部队出发,继续坚持工作,部分人员由于家庭有困难或另有打算留了下来,或走或留都出于自愿。在部队北撤前夕,常恩多师长特别召集宣传队女队员谈话,恳切地劝她们不要随军北撤。因此,除了张继岚、吴禾生随队出发外,其余的女队员都留下了。随队出发的人,泣别亲人,匆匆上路,这时,宣传队只剩下 14 个人了。他们是徐惊百、邹强、吴质、王衍、张继岚、陈瘦秋、王坚、吴功铨、吴禾生、薛鹤年、赵琅、梁腾、孙振中、孙卜菁。战地紧张而艰苦的生活磨炼着这批青年,特别是徐惊百,他从小患过髋关节结核,一条腿是瘸的,他拄着手杖,虽行军艰难,却很少掉队。留在地方的人们也没有“掉队”,绝大多数人都用各自适合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并且大多各有建树,成为各自行业的专家。后来我们才知道,张聪武、吴功铨参加了地方部队,于 1938 年中秋节在如皋,被日军杀害,钱彤在教育岗位上坚持

了抗日民主斗争，他是在 1946 年“ 3·18 ”南通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的烈士之一。江涛离队后，一直坚持在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岗位上。

111 师在扬州仙女庙一带阻击日军登陆，重创敌军之后，便集结到高、宝一带整训。1938 年初，师部驻在宝应城。宣传队也进行休整学习。10 月，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国民党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地溃逃之时,中国共产党发动当地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地区的光辉业绩，已在苏北群众中流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把进攻重点转向‘ 扫荡 ’敌后解放区。国民党在敌后建立了‘ 冀察战区 ’、‘ 鲁苏战区 ”，压迫限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8 年 12 月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投敌，组织南京傀儡政府。这时期，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严重的动摇和分裂。面对着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有的宣传队员的思想发生波动，想到“ 大后方 ’去,或者到延安去,还有的想回家乡去打游击。在师工委领导下,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大多数人认为还是跟 111 师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比较现实，由于徐惊百、邹强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宣传队终于稳定下来了。1938 年春，孙振中、梁腾因为家庭要照顾，去上海教书。赵琅受团体委托回南通探望并动员青年参加宣传队。吴功铨、吴禾生也同行。后来新四军东进,赵琅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江北特委领导下,成为新四军开辟通东地区的骨干之一，为扩大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北京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那时，宣传队只剩下九个人了。我们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学习与团结，一方面继续开展部队与地方的活动，在部队教唱新的抗日歌曲,如《军民合作一条心》、《大刀进行曲》、《抗战到底》等。

在街头和连队宣讲抗战形势,编写油印快报,散发到连队,后来定名为《烽火报》。我们还利用春节拜年,到部队去串门谈心,结交了更多的进步军官。他们称我们是‘部队的灵魂”。我们鼓励他们作抗战的中坚。1938 年 4 月至 7 月,我们还分组随战斗部队去战地工作,徐惊百、邹强、孙卜菁等曾随 331 旅东进盐阜地区工作,该部歼敌很多,曾攻克阜宁城;8 月,随 661 团越过津浦铁路,出敌意外,攻进徐州城区,牵制了进犯武汉的敌军;也曾对参加台儿庄会战胜利回来的王肇治旅长率领的 333 旅进行祝捷劳军。9 月,也曾随师部行动,进入安徽,在定远老人仓地区与部队共同经受了蒋坝、嘉山一带疟疾流行地区的病痛生活。10 月武汉失守后,回师苏北,后来,我们才知道,111 师的这一连串行动,是在共产党工委领导下,由常师长指挥的,非但策应了武汉保卫战,而且实现了周恩来的指示,留在苏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8 年 11 月,111 师回苏北的淮阴、宿迁、沭阳一带休整。宣传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在师工委领导下,经常师长同意,进驻 331 旅旅部,争取旅长唐君尧的支持,把工作推向各团,为以后举办‘军士队”作准备。由于部队行动频繁,一直到 1939 年 9 月间,在鲁南孙家柳沟(大柳沟),成立了‘军士队”,学员 120 人,为期 6 个月,到 1940 年 3 月间结束。由 662 团中校团附孙立基任队长,共编 3 个分队 9 个班:一分队队长刘肇恩(661 团二营四连连长);二分队队长赵开云(662 团二营五连连长)三分队队长傅永贵(331 旅部上尉参谋)。从 12 个连各选调一个排长担任班长。以政治课为主,辅以文化课。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为基本教材,讲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讲军民合作,团结友军,抗战到底,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等。由徐惊百、邹强、吴质、孙

卜菁等人编写讲义和识字课本，并担任教员。由王衍、陈瘦秋、王坚、张继岚等人组织文娱活动。军事课由孙立基等军官担任，主要讲游击战争。集训期间的 11 月，莒县、大店敌人出动“扫荡”，军士队曾向东转移到山西头，12 月又返回孙家柳沟，曾举行军民秧歌联欢，欢度春节。军士队办得团结紧张、生动活泼，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学员结业回去后，都是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骨干，有的提升为排长，个别的提升为连长，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军士队，我们结识了孙立基，发现他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团结抗日的指挥官。他鄙视国民党，崇信共产党，他对张学良将军和常恩多师长有着深厚的志同道合的感情。他谈到“西安事变”前后，111 师在西北联合红军的许多故事，特别是谈到曾奉师长之命去与彭德怀联系，还得到任弼时接见的情况，讲到叶剑英参谋长的风度时，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表达了他倾向革命，热情进取的胸怀。他对宣传队员亲如手足，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妥善照顾。这为以后宣传队在复杂的斗争中克服困难，增添了有利的条件。后来，孙立基在“8·3 起义”的殊死战斗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宣传队的工作深入开展，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力量与形势不相适应了。1938 年春，在中共师工委的领导下，在淮阴、沭阳招考，从群众救亡团体中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加宣传队工作。4 月上旬，在淮阴西坝招考新队员，录取了周丕炎、王英才（吴明）、王悟民、钱微阁等入队。在淮安吸收李复炎、李承伸入队。11 月，国民党政治部在淮阴《战报》登广告，招考宣传队员，录取了刘祖荫、郜曼伯、朱衍庆、洪孽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女)、曹国奇、文仲仙、曹玉萍、杨毅安等人入队。12 月,又在沐阳吸收孙学仁、徐振宇、杨奇英、吕梦林(女)、吴瑾瑜等入队。1939 年春,陈信南、王秀(女)由部队转来。在安徽五河时吸收顾庆云(女)入队。以上先后吸收新队员 20余人,还有炊事员严溥泉。通讯员刘常胜等。国民党政治部妄图趁机网罗爪牙,从政治上控制宣传队,其中也确有少数人意志薄弱,有的被顽特收买利用,有的跑到国民党政训处做官,但大多数队员都自觉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坚持斗争。宣传队发展壮大了,我们又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活动了。当我们在王营、西坝等地向部队和群众演出工农联合抗日的戏剧,并指导士兵排演中国联合苏联打日本侵略者的活报剧时,得到常师长和进步官兵的热烈赞赏。常恩多说:“这样就好了,这样的戏演在人心上,看了使人振奋有希望”,这时,正是团结抗日的旺盛时期,军心民心欢腾鼓舞。

1938年冬到 1939 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转折与发展。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重点从对 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及蒋介石,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 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3 月初,罗荣恒率八路军 11 五师一部进入鲁西地区,八路军发展很快,山东群众发动起来了,山东根据地迅速建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陈毅,努力向北挺进,也已创造了向北发展的

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原在鲁南的石友三的 69 军调往冀南，国民党军政部下令，57 军填防鲁南。57 军军长缪澄流留恋富裕的两淮地区,但军政部调令又不得不敷衍,就与 111 师师长常恩多商量。这时师工委收到周恩来的指示电,要 111 师力争到山东去，受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依托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民和八路军，争取应付更复杂的形势，而立于不败之地。工委将这一指示转告常恩多，这正是反映了 111 师广大官兵的心愿。促使常恩多当机立断，转战到山东去，并令 333 旅为先头部队入鲁。抗日义勇宣传队久已向往八路军和山东根据地，闻讯后欢欣鼓舞，积极准备行军，跟师部行动。1939 年 1 月,常恩多率师部、直属队及 331 旅(欠 661 团)入鲁，661 团(驻团宣传队员徐惊百、邹强、刘祖荫、王坚)留在军部外围担任警戒，一直到 1939 年春，才到鲁南归还建制。

333 旅旅长王肇治率先头部队从沭阳出发，他紧记常师长的“:老百姓是水,部队是鱼,鱼离不开水,部队若是离开了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你要跟老百姓搞好团结，要注意严肃军纪，把兵带好”的谆谆告诫，王旅长情绪高涨，豪情大发,为了鼓舞士气,教育部队,自编了一首‘吃饭歌”,歌词是“:我们吃的饭,关的饷,穿的服装,样样都是老百姓的血和汗，老百姓耕织多辛苦，没有他们，我们不能活，没有他们,我们不能活…… ’孙卜菁谱了曲`,在入鲁行军途中,部队不断齐声高唱，军威甚壮。派往 333 旅 665 团的宣传队员曹玉萍、郜曼伯、朱衍庆走在部队前头,沿途散发宣传品,受到鲁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9 年 1 月，师部驻在莒县城南大于庄两个月，我们看到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军爱民，民拥军，真正做到军民团结亲如一家。中共山东分局已对地方作了布

置，欢迎、支持 111 师入鲁，常师长在党工委的帮助下，提出了“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 111 师和八路军官兵之间经常往来,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在给养、枪械、弹药等方面，111 师官兵设法给八路军以支援。3 月 12 日,宣传队在招贤镇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个工作队联合举行了纪念孙中山逝世 14 周年的活动。这期间,共产党的《大众日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刊，小册了，陆续传到了 111 师，在部队和宣传队内部掀起了一个学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热潮，宣传队员从政治理论、文艺观点、宣传方法、工作作风以及生活方式，在学习中吸取了新鲜养料，都有了进步变化。有的同志认为找到了观察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钥匙；有的同志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承认人民终究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次学习，对提高 111 师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以后在歼灭日伪军的多次战斗和反国特摩擦斗争中不断取胜的根本因素。这期间，在大于庄师部曾办过军官训练队，由张绍骞任队长，徐惊百、邹强、孙卜菁参加，讲授抗战形势，王坚教唱抗战歌曲。后因日寇“扫荡”,提前结束。

1939 年春,111 师为了向山东军民表达团结抗战的意志，决心拔除盘踞在诸城县境台淮路上的枳沟镇一带的张步云伪军据点，为民除害。常师长命令 331 旅 662 团北进诸城，与八路军某支队密切配合，一举攻克枳沟据点，歼灭伪三旅大部，毙伤俘近千，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给养等。战后，常师长命令将缴获的武器、弹药等交给八路军游击队，以壮大地方武装力量。接着，又在孟疃附近，歼灭出犯的日军大部。111 师在山东首战告捷,体现了与八路军联合作战的威力。喜

讯传来,士气民心大为振奋,周围一二百里的群众代表,带着大批年货,来慰劳这支团结抗战的部队。时值新春佳节,宣传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联欢活动,配合连队开展文化教育,军民联欢，一片欢腾！

后来才知道,就是在这 1939 年春,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代表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到大于庄来,对常恩多进行考察后,由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吸收常恩多为中共特别党员。

转　　折

正当鲁南团结抗日形势有了蓬勃发展，军民欢庆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也正在加紧实行“限共、溶共、反共”的阴谋。同时,日寇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夺取淮阴“扫荡”沭阳、宿迁、东海、灌云一带地区。57 军军长缪澄流是个沉迷酒色的大烟鬼，他贪生怕死，无心抗战，他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之流勾结在一起，苟且偷安，甚至企图卷款逃命去上海。当时他拥有五个团的兵力，却因指挥无方，遭受很大损失，被逼向鲁南靠拢。逃到鲁南不久，又逢日寇麦季大“扫荡”,他被吓得丧魂落魄。他不仇恨日寇,反而埋怨张学良,咒骂共产党,对爱国青年妄加非议。日军“扫荡”后,局势稍有稳定，他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秦启荣等勾结，又积极反共，制造摩擦，血腥惨案越演越严重。这时，蒋介石密令对敌后国民党控制的部队要实行“全军皆党”,勒令各级主管按官士兵夫花名册，统统上报为“国民党员”。111 师国民党政训处的特务们又蠢动起来。这年 4 月，师部第二次驻在大于庄时,匆忙上演了一场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丑剧。实

质上，这也是我们对其进行的一场合法斗争。事前，宣传队员们已经听到风声，纷纷抵制，表示决不参加‘刮民党”。师工委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后，说服大家，为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不予公开反对，可以随集体参加。在举行“入党”仪式的大会后，宣传队员们听到许多官兵忿慨地议论，说国特们吃饱饭撑的，不打鬼子专干混蛋事。有的感到受了侮辱，顿足骂娘。国特们当众现了原形，真是事与愿违，国民党政训处安排一次师特别党部总干事的选举，结果，政训处主任宋迪玺落选，我党工委负责人王维平当选，师长常恩多为师特别党部的当然书记长。从此，国民党政训处更加孤立了。

1939 年初春，师政训处已改名政治部，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特们久已发现宣传队里有不少人才，但又感到他们是左倾的，许多言论和共产党差不多，对部队的影响越来越深。这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要对宣传队进行改编整训，企图借此向宣传队员们灌输反共思想，并将宣传队改名为“111 师政治宣传队”，妄想变为他们反共的工具。整训前，我们已经摸清了政治部的意图和手法，研究决定我们的对策是坚持团结抗日，坚持民主进步，并决定由吴质出面与政训处交涉，强调我们是穿上军装的青年学生，集训应以军训为主，没有军事知识怎么抗战？不能安排别 的课程干扰军训。接着我们便忙于队列、射击等科目的学习，他们讲其反革命的所谓‘三民主义”，我们学习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他们执行他们的整训计划，我们执行我们的学习计划。上讲堂，我们可以打瞌睡，下讲堂，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组织讨论。必要时，我们采取提问题的方式，驳斥他们的谬论。例如：有的问教官“：实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能够团结抗战吗？这和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实行民主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又问:'限制异党活动,的这个'异党,究竟是指什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应该叫友党,不是'异党"。投降日本的汪精卫的汉奸党,才是真正的异党,是不是指汉奸党呢?"又问:"现在有公开的汪精卫,有没有秘密的汪精卫呢?"这一连串问题,问得政治教官熊矮子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只有一走了之。政治课只上了两节,就没人来上了。半个月过去了,国民党政治部苦心经营的所谓长期整训计划,一无所获,只得草草收场,在部队里被引为笑谈。宣传队却受到一次锻炼,进一步认清了国特们的丑恶本质,我们内部更加团结坚强。但为时不久,又发生了国特们分化拉拢吴瑾瑜之事,遭到吴的公开反对和揭发,使其阴谋败落,大为恼火,后吴去八路军。

1939 年 6 月,日军集结了两个半师团的兵力,向鲁南地区疯狂地进行麦季大"扫荡",鲁南人民处于严重的灾难中。师政治部的国特们从主任到政训员,都吓破了胆。纷纷逃往日莒路北山区的临时后方留守处去了。这时,常师长在指挥反"扫荡"战斗中,急调宣传队到前方师部,组成了"战地工作队",任命秘书王维平兼任队长,译电员张苏平担任民运组长。常师长新自作动员,他坚定地说:"那些坏家伙跑了,咱们来干国家的事咱们来负责,一定要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日寇血拼到底"。经由师工委和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战地工作队就地吸收了李倩(女)、黄毅、王烈、曹成镒、刘金淦、徐泽生(鲁平)、董滨、赵文英(女)、孙勇(女)、郑冷、王丕争、于洪亮、崔伯勋、王政(女)、黄鹏、邓坤等同志,原在 666 团的吉凯也调到战地工作队,很快发展到 60 多人,少数留在师部,大部分跟随战斗部队在战地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抬担架、当向导、筹办给养,密切配合地方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